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烧毁？	徐景贤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五）	钱理群
【史实辨析】	致马双有先生：关于“林彪‘逃席事件’的真与假”	张光渝
【往事非烟】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清队”	安希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烧毁？

• 徐景贤 •

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和在刘武生著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这两本书中，都写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扩大会议。高书写道：“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全部销毁。”刘书写道：“由于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尘封了整整三十多年的这桩历史公案，只能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窥见。”

我看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如此重要的会议的原始记录，怎么会“没有保存”呢？如此珍贵的中央档案，怎么会“全部销毁”呢？在高书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邓颖超同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倒是透露了一些销毁的过程。据邓颖超说：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记录后全部销毁。

看了这些文字，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我一直想要证实和探究这件烧毁档案的重大事件，而觉得不能“顺便一提”，轻轻放过。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烧毁重要档案、特别是中央的核心机密档案，都是不能允许的。

◇ 批周会档案已被证实全部烧毁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见面，见了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赵炜已经有七十多岁高龄了，但她双鬓微白、精神矍铄，至今仍在各地讲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平事迹。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邓小平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周批得很厉害。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政治局批周会的档案，终于证实已被全部烧掉了。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情况，过去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极小范围内的少数人知道。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从未向上海市的领导透露过任何有关信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批判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才逐步地把批周会的内幕揭开。

时至今日，在海内的权威出版物中，总算有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介绍。例如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中写道：“（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从上述文字来看，政治局批周会就是江青、姚文元等人对周恩来的“围攻”和“诬蔑”，而且江青等另有野心，想当“常委”；毛泽东虽然提议召开此次会议，但及时发现了江青等人讲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等错话，“保护”了周恩来，并制止了“增补常委”的阴谋。既然如此，政治局批周会的原始记录岂不正是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阴谋夺权的绝佳材料，妥善保存和大量引用还来不及，却为什么要在江青等人被捕、判刑之后急于烧毁呢？邓颖超、叶剑英要求为批周会平反，这是合理的，中央据此作出平反决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偏偏要把中央的重要档案全部烧毁？此中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找了相关的人员作了了解，终于对这宗疑案有了初步的结论。

◇ 批周会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

批周会的起因全在毛泽东。

林彪事件以后，从一九七二年起，周恩来就着手在各个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可是毛泽东担心反对极左反下去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周恩来的批极左就再也批不下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要外交部对美苏峰会进行研究，外交部当即出了一期《新情况》，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对世界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对这期《新情况》加以称赞，毛泽东却认为不符合他对国际形势的一贯分析。七月四日，毛泽东不找周恩来，偏偏找正在筹备中共“十大”的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名为批评外交部，实际点了周恩来的名：“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毛泽东“劝告”张春桥和王洪文：“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在这里把话说得够重了：什么“屁文件”，“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贼船”，“搞修正主义”等等，完全把问题的性质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当天晚上，张春桥向政治局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当然觉出了这个批评的份量，一边撤回外交部《新情况》，一边向毛泽东写检讨。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此类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周恩来作了四次正式会谈，三次单独会谈。在会谈时，周恩来都是严格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口径谈话的。十一月十二日，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毛泽东，基辛格说苏联要摧毁中国的核能力，而美国“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基辛格想让美国替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这使一向强调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快，他当场向基辛格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苏联“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毛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保护”。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作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商定了“公报”的措词。“公报”全文送毛泽东审定。会谈本已结束，基辛格也将在十五日上午离开中国。但是，就在启程回国前几小时，基辛格又突然提出，要单独拜会周恩来，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周恩来马上用电话请示毛泽东，回答是主席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佳，不忍心叫醒他，但对基辛格又觉得不见不好，就在译员唐闻生的陪同下与基辛格作了单独会谈。

会谈时周恩来对于基辛格提出的问题，由于未及请示毛泽东，所以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只是答复：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在基辛格后来写的《基辛格秘录》一书中，在“会谈备忘录”里也记下了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一国总理，这样回答并未丧失原则，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当场顶回去，同时在事后又没有把最后一轮单独会谈的情况补报毛泽东。

谁知，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周恩来的重大罪错。以毛泽东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气魄和敏感，他认为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不向他请示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任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对此批评说：“对美

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20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

◇ 毛泽东为批周会定调

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乔冠华）、姬老爷（姬鹏飞）的贼船”。在谈话记录送审时，毛泽东把乔、姬两人的名字删掉了，这里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大笔一删，便把周恩来和林彪相提并论，这又为“路线斗争的头子”的头衔定下了基调。

与会的人听了毛泽东指示的传达，都感到震惊。就像乔冠华后来所说的，听了联络员传达毛主席的话，简直“毛骨悚然”。

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

与会的章含之后来在她的回忆录《我与乔冠华》里写了一段话，说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而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

他的压力。”虽然说得躲躲闪闪，但却道出了几分真实，并且说明与会者“没有一个”不对批周表态的。

至于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会上当然跟得更紧，江青嚷嚷的“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头子”，根据就是毛泽东批评周是“修正主义”的“儿皇帝”和“贼船”的“老板”，只是上纲上得更高，差一点就可以把周恩来打倒了。

据原在王洪文处工作的萧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诉我：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秘书小沈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一号铅字般大小的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为了保密，记录不能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只能手抄。

由此可见，《周恩来年谱》认为批周会是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的“围攻”、“斥责”和“诬蔑”，显然是片面的，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的亲自策动和指挥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人员对周恩来作了围攻、斥责和诬蔑。”

在这里需要补叙一个插曲：过了一段时间，当时参加批周会的乔冠华在接待外宾时见到周恩来，向周当面表示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对不起周恩来，请求原谅。周恩来慨然说：“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可见，周恩来对于谁要整他，完全是心知肚明的。

◇ 邓小平既捧毛泽东又诛周恩来

邓小平当时只是十届中央委员，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毛泽东却指定他参加批周会，要看他在会上的态度和表现。

邓小平在会上发了什么言？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发言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

照毛毛这样说法，邓小平只是“寥寥数语”批评周恩来，这能够使毛泽东满意吗？事实上，毛泽东十分关注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在会议过程中，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小平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毛毛自己也写道：毛泽东听说邓小平发言以后，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作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这就产生了矛盾。邓小平如果只是“寥寥数语”批评周恩来，怎能引起毛泽东的赞赏，并且马上要把他请来作“彻夜长谈”呢？

终于，我们从纪登奎的谈话中知道了真相：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了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作了一个谈话纪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邓小平的“提醒”真是份量很重：你现在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距离主席是“一步之遥”，只有你有资格“可望而可即”，取毛主席而代之，希望你警惕。邓小平不像江青说得那样露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他说得更高明，更含蓄，既捧了毛泽东，又“诛”了周恩来，令周恩来更加有口难辩。事实上，十分本份的周恩来自遵义会议以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他一直非常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所以，他对邓小平和江青的发言感到非常委屈，最后只得在检讨里写上：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邓小平凭着和周恩来几十年的交情，明知周没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却偏要这么讲，完全是为了取悦于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在得知邓小平作了这样有份量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这才动起了和邓小平作彻夜长谈的念头。

邓小平通过了毛泽东的“考试”，毛泽东才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十多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不忘记继续“敲打”周恩来，指责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他还借打仗说事：“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说明他余怒未消，继续向周恩来发出警告。

◇ 烧毁批周会记录原因何在？

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中美会谈的叶剑英，这次也“陪绑”一起挨批。叶剑英也写了一份检讨，题目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们两人在会上作了检查，又挨了一顿批。

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于是，一场高层的批斗会至此正式落幕；时至今日，随着内情的不断披露，批周会的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我们所探索的烧毁批周会原始记录的原因，终于露出了端倪：

- 一、是为了替周恩来、叶剑英平反，把他们的检讨烧了；
- 二、是为了保护复出的邓小平，保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等人，把他们批周的发言统统销毁了；
- 三、是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归咎于江青等“四人帮”；
- 四、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 五、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了批周的总后台、总指挥——毛泽东。

墨写的记录是可以烧毁的，但是历史却销毁不了。它镌刻在世纪的崖壁上，随着时间的磨洗，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实面貌。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

# 【读史笔记】

##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五）

• 钱理群 •

（续 z k 1 6 0 5 d）

## 第二部分 反思与反省：这是为什么？

文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痛苦又难堪的记忆。在痛定思痛时，人们开始反思与自省。特别是最近几年，提出了“我们忏悔”的命题，认为这是经历文革这一代人的“政治责任”、“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55〕这是一个严峻的追问：文革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在文革狂信与杀戮的背后深藏着怎样的“中国问题”？我们每一个文革参与者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课题，我们今天的反思与反省仅是一个开始。根据现有的认识，我们将讨论四个问题。

### （一）教育问题

前文已经说到，红卫兵这一代是“狼奶喂养的一代”。那么，这是怎样的“狼奶”？是如何“喂养”的？喂养的结果如何？这就必须谈到文革前的教育问题。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文革前，主要是1963——1966年间，在青少年中开展了五个方面的教育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学习雷锋运动，培养接班人的教育运动，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争文件“九评”的教育运动，以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教育运动。这五大教育对这一代人的影响至深，至远，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些革命教育的中心是树立“革命第一”的观念，“把革命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56〕为了“革命”，一切都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权利，以致生命；一切都可以越过、抛弃与不顾：人性、人情的底线，基本人伦关系；一切都可以毁坏：科学、文化、艺术、历史文物；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如一位历史的当事人所说，“‘神

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运动中的一切都具有天然不可置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57〕很多人都说红卫兵这一代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己至今也还在坚持这一点，这似乎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有人追问：这是怎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确实有“超出一己的私利”的献身精神，因而显得高尚而神圣；但它却是以“革命至上”的观念为指归，就如论者所说，“这种理想主义并未带来人民的福祉，科学艺术的创新，而是导致破坏与毁灭”。〔58〕这样的“革命至上理想主义”是直通文革的。

当然，关键还在这背后的“革命观”。这一代人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观，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在文革前及文革时期，有三条毛泽东语录最为盛行，人人皆会背诵，可谓“深入人心”。

第一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把革命暴力化了。而且毛泽东更提倡群众暴力，造反者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就是要“乱来”，“独裁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将一切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9〕这样的暴力革命观不仅成为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文革大杀戮的理论根据，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暴力崇拜之外，更有一种以粗鄙为荣、蛮横自负的“痞子气”。在文革中“痞子”成为“革命先锋”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篇回忆文章就谈到其所在单位的一个女杂役成了革委会副主任，“那凶残，那野蛮，真是把中国的‘贫下中农痞子’演示得十分充分”。〔60〕在文革中后期的武斗中更有流氓帮伙的参与。所谓“文化大革命”，“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文化”则带有浓重的痞子、流氓文化的色彩。〔61〕这都在文革全民杀戮中有鲜明的表现。

作为文革前的革命教育重点，文革指导思想的毛泽东革命观的第二个方面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62〕《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的这一段语录，也同样人人背诵，深入人心。由此形成的是“分清敌我”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关系；一切矛盾、分歧，一切不同意见，不同利益与要求，都被视为敌我问题，必须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这同时也是一种“非敌即友，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红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敌对思维”，更要培养“仇恨至上”的“敌对感情”。这正是文革前的学习雷锋运动的重心所在。什么是“雷锋精神”？核心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与感情”。人人耳熟能详的雷锋语录就是：“对待同志要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一位红卫兵后来回忆说，雷锋的这些话语，“是渗透我的灵魂中的”，文革中他就是像雷锋那样，响应共产党的革命号召，把鞭子“残酷无情”地抽向党指向的“敌人”的。〔63〕

深入人心的，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个革命号召：“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与坏人。我们善于辨别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人们”，要警惕“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64〕提高革命警惕性也是文革前的革命教育的重心，由此形成的是论者所说的“阶级斗争迷信”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更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一切问题的思维模式”以及“阶级斗争的想象力”，到处寻找与发现“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坏人”，“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65〕文革前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阶级斗争教育以及文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寻找与制造隐藏的阶级敌人，凭借想象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群众政治实践。一位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在参加了据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电影”《二月》的批判，接受了阶级斗争教育以后，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来，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我过去崇拜的老师竟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给我们全面传授这么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66〕在这样的引导下，许多学生都把自己想象成身处阶级斗争第一线的战士，当文革发生时，党和毛主席宣布，他们崇拜的老师和校长，都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把鞭子抽向老师与校长，就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习雷锋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文革前就开始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这样唱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样就把革命崇拜与领袖崇拜统一了起来，革命至上最后落实为领袖个人意志至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盲从与驯服的人格。这样的“忠诚”与前面已有讨论的“反叛，仇恨”的结合，就构成了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的基本精神素质，也是红卫兵暴行的内在精神元素。〔67〕

对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影响深远的，还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1964年6月毛泽东作了《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由此而开始了接班人教育。据说这“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68〕其实质与要害是一个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第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是否能够千秋万代传下去的问题。这就为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提出了一个“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政治目标。研究者指出，其直接后果有三个方面。

“第一，大大地把学生导向政治，大多数学生原先以当科学家为目标，现在，他们转而认为当接班人是光荣的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与前途，成为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甚至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同时唤起的是对国家、民族、党的事业的历史责任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因此成为许多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更自觉地以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政治家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这些人后来都理所当然地成了文革的骨干。第二，“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因为不管使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接班人’这个概念和封建时代的权力继承毕竟有相通之处，即‘父权子承’”。事实上，对接班人问题反应最为强烈的也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即红二代。血统论就是他们天然接班的理论依据。本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党就在学校里提出了“阶级路线”的问题，1964年提出接班人问题，阶级路线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与迫切，学生也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发生了急剧分化。后来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骨干，绝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初期发生的血统论论争，由此引发的相互残杀，都预伏在这一时期围绕接班人问题发生的思想动荡之中。“第三，引发或加强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竞争倾向”。〔69〕这或许是许多人参与文革的潜在的动因，也是文革残杀的内在根源：我们已经说过，文革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权力再争夺、再分配。开始或许并不自觉，随着陷入愈深就愈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追求与努力。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论战推向高潮，时称“九评”，其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第一等大事，前一天晚上预告第二天有重要文章发表，大家就在早上七点半守在收音机旁，或在公共场合的大喇叭

下，听中央电台当时家喻户晓的播音员夏青和齐越，用他们特别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读评论文章；他们读得声情并茂，听众也完全被文章的逻辑力量和语言魅力所征服。这样的影响也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使这一代人的政治关怀由国内扩展到世界。其意义也有两个方面。它首先是被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陷入“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去拯救”的主观想象之中，是典型的做不完的“中国梦”。有些红卫兵就是带着“解放全人类”的幻想投入文革的，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另一方面，其潜在的命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要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对这一代思想与思维的影响也有积极的意义。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时，同时提出的就是“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其二，由此引发的，是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浓厚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在最初的革命狂潮过去以后，他们“力图在官方宣传机器之外，独立地阐述自己对于文革的理解”。〔70〕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思考，从“九评”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问题开始，但得出了与“九评”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结论，形成了文革民间思想。其三，对这一代人影响更大的，是“九评”所显示与代表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我曾经把这样的“九评”文体特点概括为“以真理、人民的代表自居”、“高屋建瓴，以势取胜”、“华丽语言”与“调侃”、“流氓腔”的结合。〔71〕文革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都竞相模仿这样的对读者、听众极具情感的煽动力与心理控制力的语言，形成了文革“大批判风”。

以上分析表明，经过文革前的五大教育运动，已经在中国青少年中，培育出了一整套以“主义至上”、“革命至上”为中心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当年的参与者在反省中，将其概括为“卡里斯玛人格崇拜”，“敌对思维”，“暴力崇拜”，反启蒙（人道、人性）的“仇恨情感”，“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二元思维”，以及“英雄话语”，“宏大话语的叙事习惯”，这同时也是能力的培养，“仇恨的能力、极端思维的能力、把任何小事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的能力，‘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能力，等等。这些浸满了“狼汁”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教育与培养，都是在为文革作准备，在文革前“只是酵母”，“在文革中能量的爆发则膨胀得无边无涯”，最后形成了“文革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和能力”，造成一代人、几代人，以致国家“精神疾病”，前文所描述的文革全民狂热与残暴，就是这样的精神病状的反映，是狼汁喂养的结果。而当年向孩子喂狼奶的老师、家长，到文革中就被喂大的狼孩活生生的吃了：这是最大的历史嘲讽与悲剧。反思、反省者最后说，这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和民族曾经有过的“心的选择，，何违之有？”而“真正的枷锁在自己内心”。几十年过去了，文革当年遗留的心的毒瘤我们真的割舍了吗？〔72〕

（未完待续）

~~~~~

【史实辨析】

致马双有先生：关于“林彪‘逃席事件’的真与假”

• 张光渝 •

近来看到了马双有先生2014年9月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林彪‘逃席事件’的真与假”（见本刊zk1412c—编注），因为其中内容与本人有关，且有不同见解，特提出商榷如下。

马先生称，杜修贤先生在《共和国红镜头》一书中讲述的1971年五一节晚会上林彪迟到又早退的“逃席事件”虽然受到了质疑，但“在没有铁的证据和权威材料来推翻杜修贤先生的观点以前，关于1971年“五一节”焰火晚会‘林彪逃席事件’的描述和定性，我

还是信奉杜修贤先生的观点；对刘家驹先生的观点是半信半疑；而对冯锡刚先生的观点，我是完全不信。”

也就是说，杜修贤所说的林彪在晚会上迟到又早退的事情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与此相反的观点马先生是“完全不信”的。

马先生坚持自己观点的前提有两条。

第一条，马先生认为，杜修贤老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无数人都在阅读、品鉴、传播，无数的媒体记者和作家都在摘引、改编、演绎，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却几乎无人质疑。尤其是80年代，许多参与者、当事人、知情者都还健在，杜先生的文章他们肯定都看过，当时天安门城楼上那么多记者、警卫、秘书、服务员等人也一定看过，一些健在的中央领导也一定看过。这么多人都没有发出质疑，提出反对，反倒是过了几十年后，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杜修贤先生于2014年6月15日去世）某些人却发出质疑，说杜修贤‘一派谎言’，要推翻杜先生的观点，岂非咄咄怪事！”

就此，我要声明，不客气地说，据我所知，我是质疑杜修贤先生所谓“林彪迟到”说的第一人，而且是在杜修贤老先生还健在时公开提出的。此前，我特意从图书馆找到了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复印了头版带有两张毛林合影照的五一晚会新闻报道。专门为杜修贤的“林彪迟到”说查找有关报纸的，我也是第一人。

2009年8月《领导者》杂志总第29期发表了我以“俞虎”笔名发表的文章《浅谈〈共和国红镜头〉中的瑕疵》，其中就谈到了1971年五一晚会叙述的不实之处：

首先，杜先生借周恩来之口说毛泽东和林彪五一节上午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林彪因此在晚上称身体疲劳而拒绝出席焰火晚会。经周恩来一再促请，在毛泽东与外国贵宾已经入座后，林彪才姗姗来迟。

我指出，早在文革之前，五一节游行就已经取消了，杜先生的说法是无中生有。

其次，杜先生说，因为林彪的迟到和早退，当晚所有影视报刊和新闻单位的记者唯独他拍到了毛和林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为此，他在晚会结束后还专门到总理办公室商量如何使用这张十分关键的照片。杜先生说：第二天的报纸上只有他拍的毛林围坐在桌前的那一张照片。更有甚者，因为没有其他影视资料，连电视新闻中使用的也是杜修贤那张固定图像的照片。

我指出，五月二日各大报刊头版都同时发表了毛和林在一起的两张照片，另一张是毛泽东、林彪两人与周恩来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众人欢呼致意的照片。因此，所谓“唯一一张”照片之说不能成立，因此林彪迟到说也就没有根据。我还特别提到，杜老在文章中说他在“上午”游行活动时拍到了林彪跟在毛泽东身后登上天安门的镜头，他的感觉是林彪与毛泽东反差太大，看起来“滑稽”、“单薄、不上照”。我推测，杜老是将晚上拍的那张毛林一起登上天安门的照片错记成根本不存在的“上午”的照片了。那才应当是杜在晚会上拍的第一张林彪的照片（在毛林入座之前的照片）。由于林彪的早退（这是事实），也许杜只拍了两张林彪的照片。

还要说明：5月2日的报纸上只字未提5月1日上午毛、林“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至于马先生问，为什么那么多参加当年晚会的人都没有提出质疑，这只有问当年参加晚会的人，不能问之后的质疑者。五一上午没有群众游行，五一节第二天的报纸上是两张而不是“仅此一张”照片，这些史实根本不需要当年的参与者作证。为什么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纠正？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解答吗？

此外，我在《浅谈〈共和国红镜头〉中的瑕疵》中，还列举了《共和国红镜头》作者（顾保孜著、杜修贤摄影）的其他叙事错误。比如：称李宗仁回国时乘波音747客机；称毛泽东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与斯诺的合影发表在10月2日的报纸上，而且照片中首次没有林彪；称邱会作是在1971年国庆节后访越归来才被扣押；称陈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因反对林彪天才论而挨批，等等。这其中只有国庆节照片发表时间和人物的事情，在我之前已有宗道一先生专文纠正，其他事情，也没有任何“当事人”出面澄清。难道因此就证明《红镜头》的这些记载是对的，是不能质疑的？

马双有先生立论的第二个前提是：“冯先生的观点，完全产生于1971年5月后生产的电影纪录片。而这位先生却忘了一个起码常识：那时的所有新闻宣传工具，都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控，电影厂制作的纪录片和所有的报刊新闻一样，都要经过江青等的严格审查、把关；尤其是林彪‘犯事’后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电影，对之恨之入骨的江青张春桥在审查时，不知要费多少心机！”

“至于这镜头是今年‘五一节’的，还是去年‘五一节’的，还是从别处剪来的，只有江青等人知道。”

2014年4月，《老照片》第94辑发表了我关于1971年五一晚会的专题文章《最后的晚会》，此时杜老依然在世。文章除了依据我在2009年《领导者》杂志发表的主要观点之外，还加上了1971年五一劳动节新闻纪录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有关内容。在网上找到的这部纪录片视频中，林彪不仅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还微笑着在毛泽东身边与从城楼大厅中走出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其他外国贵宾一一握手。林彪与众人一起走下台阶，做在观礼台栏杆前的圆桌边，影片数次出现林彪的镜头。

现将视频链接提供如下：http://v.ku6.com/show/9WGHibnw_tc5C7e_.html。

读者也可以在百度上输入“1971年五一劳动节纪录片”等文字搜索，很容易得到这部影片的视频。

马先生一口咬定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伪造了纪录片，称“至于这镜头是今年‘五一节’的，还是去年‘五一节’的，还是从别处剪来的，只有江青等人知道。”

在此，我特别提请马先生，应当按照您所说的条件，提供“铁的证据和权威材料”来证实这部纪录片有伪造内容，因为这部纪录片本身就是林彪没有迟到的“铁的证据”。如果没有更“铁”的证据推翻它，而只是想当然说江青张春桥“炮制”了假影片，马先生的观点是立不住的。

1971年，有没有技术手段在纪录片的胶片中无中生有加入与特定现场（天安门城楼、圆桌、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以及众人服饰衣着）一致的活动镜头？谁证明这是伪造的？如何证明是伪造的？为什么“亲历者”杜修贤在《红镜头》中不提及这个伪造？

既然是马先生对影片真伪提出疑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我们将静等马先生提供的“铁证”。

当然，从杜修贤先生“唯一一张照片”的说法推理，五一节第二天报纸上登载的另一张照片肯定也是“伪造”的。应当承认，中国在照片方面的“移头术”当时已经很“先进”。问题在于，既然杜修贤先生在深夜刚刚和周总理议定使用那“唯一”一张照片的办法，并坚称连电视新闻中也用的是那一张照片，那么，面对早上（杜说，与周商量照片时就已经是五月二号了）报纸头版意外出现的第二张照片，杜老会完全无动于衷，既不疑惑也不惊讶？或者对此毫无印象？难道杜老不看报纸？就算是因为政治高压，杜老当时不敢挑明真相，为什么到了晚年写书揭露四人帮时，依然守口如瓶，不做解释呢？

行文至此，我想对马双有先生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请马先生认真看一遍《共和国红镜头》原著全书（上下册）和网上的1971年五一庆祝活动视频资料。我读到的《共和国红镜头》出版于2006年，不知以后是否针对其中的差错做过修改和再版。在未经修改的版本中，依马先生的功力，肯定可以找出更多差错。

五一节视频资料比较长，林彪出现的镜头介于影片开始后的11分01秒到19分24秒之间。请马先生认真审视其中可能的“造假”成分，最好请电影界编辑制作内行一起，找到“去年五一节”或“从别处剪来”的内容，作为“铁证”呈现于世。真如此，我将完全放弃对杜老“林彪迟到说”的质疑，并向杜老和顾保孜女士致歉。在此之前，我坚持认为杜老的“林彪迟到”说与史实不符。

还要特别提醒马先生，这部纪录片中，在晚会结束毛泽东退场时，身后只有周恩来而没有林彪。它证实了林彪的早退。按马先生的推断，江青张春桥等人完全应该在这个镜头中也把“去年五一节”或“从别处剪来”的画面放上，以便掩人耳目。

也许马先生已经看过上述两个资料，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只好静等“铁证”了。

第二点建议，是与马先生共勉：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应秉持客观态度，避免先入为主的倾向性。

我没有读过冯锡刚和刘家驹二位关于林彪“逃席”的文章，也与他们素不相识，无法对马先生和冯、刘二位的争议做出评判。但是马先生在对冯锡刚先生的观点提出否定之后，结论竟是“冯先生拿着江青张春桥等人炮制的纪录片，来为林彪开脱，来树立林彪的正面形象，来推翻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观点，岂不是南辕北辙？江青在地下有知，岂不要笑掉大牙！”

在这段话中，同意还是不同意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观点，成了一个是否为林彪“开脱”，是否为林彪“树立正面形象”的政治标准，这就违背了史料研究客观公正的要求，陷入了预设立场、先入为主的路径。即使冯、刘二位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林彪确实迟到了，也不应该给他们扣上拿江青张春桥等人炮制的纪录片为林彪开脱和翻案的帽子。

我是第一个质疑杜修贤“林彪迟到说”的人，但我丝毫没有考虑林彪的政治标签，也没有事先选择所谓的“政治立场”。事情很简单，1971年五一节晚会，林彪迟到就是迟到，没有迟到就是没有迟到，不以林彪本人及林彪事件的政治定性为转移。

2015年第2期《炎黄春秋》刊登了我的文章《“九一三”林彪要飞往哪里？》，主要观点是批驳某些人所谓“林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的说法。我用公认事实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证，林彪一家匆忙乘飞机离开北戴河，目的地就是苏联，林彪的行为是自觉的、明确的。我既没有为林彪“开脱”或者“树立正面形象”，也没有故意给林彪落井下石。我的目的只是探讨历史真相，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在《最后的晚会》一文中写道：“1971年五一晚会的事情告诉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阅读和研究，要秉持客观、全面的立场，尽可能收集更多方位的信息，加以对比，去伪存真，切忌先入为主，切忌以主观印象和个人好恶判定和剪裁。”

我在《浅析〈共和国红镜头〉中的瑕疵》一文的结尾说：“本文只是以《红镜头》为例，阐述历史研究、考证和编辑出版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而这种失误是在许多人身上都会发生的，甚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本人对杜修贤前辈及其作品是尊重的。我的上述考证也可能会有失误，欢迎批评指正。”

特以此与马双有先生共勉。

张光渝 2016年4月24日

□ 原载《共识网》

~~~~~

## 【往事非烟】

###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清队”

• 安希孟 •

—

北京师范大学，师范也者，这两个字使得师大只能培养基础教育教书匠孩子王，不培养思想家、学术家、研究员。我很不喜欢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标榜。人各有志。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个解救全人类的抱负，酿造了灾情。其实，师大毕业后大多数人在中学，缺乏学术见识和恢弘视野，孩子王，应试应考教育，A B C D选项，标准答案，不得越过雷池。除了教科书，不了解天下大势，没有逆向思维，没有散发思维。最高理想是争当校长。当初，我舅舅就竭力反对我读师范，反对我当老师。高中同学聚会，当教师的同学就显得学识见地不高。即使文革中造反，北师大也没有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的独立思考和勇敢决绝，其二号人物压根儿就是投机见风使舵。娃娃们一腔热血，呛几口水，可也，但如果水也没有呛一口，就荣登大殿，成革委头头，就不好。中学生们一般不喜欢报考北师大。我推荐学生读研，他们一般选择人大而不选北师大，说那里死气沉沉，不鼓励叛逆。现在网上有说北师大美女。美女不敢说，女性柔弱思维和阴性知识结构多。师范，要立志做示范，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惟上是从，行端影正，这正人君子的理念阻碍着师大学子的反潮流。古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多么荒诞。师大成职业教育机构？然而，真正的老师要启迪思想，激发怀疑精神，砥砺思想，鼓励叛逆，提出新思路，别开生

命，逆向思维，独立创新。教育不是培养某个职业的人，不是职业教育，教师不是搬运工。他培养怀疑一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未经审查的人生没有价值。教师就是让人质疑、质询、挑战旧制度，重估一切价值。大学不培养旧制度的殉葬品，而培育掘墓人。

过去说北大老、清华洋、师大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文化革命师大造反多是温文尔雅奉旨罚罪，有尚方宝剑掩护。虽说北师大是培养中学师资的，政治审查不如外语学院、政法学院、军事学院哈尔滨工大严格，但也必须根红苗正，政工干部也个个比党校严肃。虽说大家都不愿意上北师大，不愿意当中学老师，但北师大应该比北大清华更左更革命才好。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1952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代校歌很甜美，很温婉。但文革狂飙吹散了和谐气氛。文革响彻云霄的是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上阵，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闯！闯！！闯！！！”

1，《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歌》（1908年）

礼陶乐淑教之基，依京国，重声施，英才天下期。党庠州序仰师资，师资肇端在于斯，学日进，德务滋，诚勇勤与爱，力行无愧为人师。

2，《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1923年（词：范源廉 曲：冯孝）

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

3，《辅仁大学校歌》（词：于斌 曲：黄友棣）

辅仁以友，会友以文。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质彬彬。福音勤播，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神旨永遵。祝我辅仁，其寿千春！祝我辅仁，其寿千春！

这些校歌，诗词宏丽多彩，不可谓不美。比较而言，德国人创立的辅仁大学校歌最典雅。但文革时期，斯文扫地。圣、美、善、真，悉被扫荡。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然而实际上，北师大学术研究风气不浓，独立思想欠缺。教师，传声筒。我们历次运动，一家不认一家人，实际上知识分子，教师，在社会各个阶层里总是喜欢表现得左一些。北师大尤其如此。社会科学，北师大无法比肩于北大。思想平稳和学术迟滞是一体。在记述文革史的时候，我们切毋忘记师大柔性的一面。

1965年秋，我入学不久，一天，在东门外铲草扫地，几个远道而来的农民问：“辅仁大学在哪里？”，我们学识浅薄，但一听辅仁二字，就知道不是好东西，连城里娃也懵了，当初选报大学时，哪儿有神马辅仁大学呀，遂答曰：中华大陆查无此校。幸亏老工友知道在定阜街，从护国寺进去。后来才从北大同学得知，师大校长陈垣是国宝，和被鲁迅痛骂过的陈源同名。也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陈垣是人大常委。1971年我在后勤处劳动时认得几个旧辅仁工友，内有一人是天主教徒，就觉着怪怪的。我们曾经打倒天主。

被冠以十年浩劫的那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是国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反思、内省，这不是羞辱，而是光彩。1965年入学教育要端正入学动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

生观（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咋就老树立不起来呢！），就是要坚定专业思想，下决心当中学教师。例如有说，收到录取通知书，人问：考上了什么？曰：大学。问：何地？曰：北京，皆大欢喜。复问：何校？曰：师范。众皆泄气。有同学说，他上大学时贫下中农把他（她）送到村口。我一听就泄气，因为我村无一个贫下中农送我出征。后来成了我太太的同学说，她村也没那回事，咱上大学跟人家有啥关系？她是贫农，但她们村贫下中也没欢送她。我心里石头这才落地。的确，你上大学，人家妒嫉还来不及呢！入学教育，每一个人都会编造一套活思想（注意，不是死思想）斗私批修。只有我，每次无言可发。现在想起来，就说学好英语支援亚非拉也行哇。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那么会整词儿。

我班两位贫下出身，入大学后就被修改了家庭成分，从贫农划为富农。爱恨就在一瞬间。我同龄的北师大一位校友这样回忆：

“我是我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考上大学，大队书记非常忌恨。我们在县里读书，考上了大学，他们不知道。次年我弟弟上初中，他们在弟弟的档案中写成上中农。此事我2014年才知道。1968年冬，我们将要毕业，师大照例向我大队发家庭调查函。我家下中农，姥姥家是贫农，舅舅是红军烈士，我父母是老实的农民。书记写材料说我父亲思想落后，不要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回家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我现在的同事，河南人，哈军工学生，贫农。大队把他的成分写成富农。”

可见此类事所在多有，地头蛇呀！我同班那位同学家庭成分忽地上升为富农，大队书记出具材料，揭发他们回村为自己家庭成分讨说法，是反革命翻案活动。

## 二

文革前夕，北师大中文系金宏达是个奇才。大四时，他以“时汉人”笔名在光明日报撰文批驳姚文元！我当时为自己的学校有这么一个才子暗自高兴。不过后来知道，这是人家把它当做反面教员发表，借以揪鞭子打棍子扣帽子，造成学术争鸣的假象。

水至清则无鱼。但人类有时候颇傻，要为鱼清理水草。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时，张莱芬隗仁莲去青岛外调调查刘淑文的historical问题，专案组杨金英暗中嘱咐，顺便调查一下同在专案组整别人专案的杨藻镜老师。这事得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整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于传曾是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将官还是校官，我忘记了。他也很紧张。还有“汉奸”孙晓康。有一次全系例行公事召开批判孙晓康大会，发言稿是我草拟，孔庆美上台宣读，代表我班发言。内容大概是日本烧杀掳掠，难道这就是你们大东亚共存共荣吗（孙晓康自供他上街刷过这样的标语）？驳得孙晓康哑口无言（他也不敢言）。这个历史污点其实早有结论了。

当然啦，我们系还有一个白俄和另外一个俄国人，就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免于恐惧？我那时没听说过。现而今，好像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活该你整日价惴惴不安。

当时我班下班的老师是：邓蓉初，王昭碧，凤泉林，林永福，陈秋帆，陈培根，孙晓兰，蒋亨俊，柳绿春，濮阳翔，耿志国，于传曾，章景琪（章头）。这是二班。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人头落地的危机意识，1968年冬，晚上在宿舍还和解放军小士兵打扑克玩儿。后来我班又和四班合并，加进来的老师有蔡文莹，都祖尧，陈正方。



工宣队进校学习六厂二校经验，先是清队隔离审查，然后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断解放一些有问题的人。当然都是已经解除隔离，但还是要花架子召开全校大会公开宣布一下，造成气氛，这就是群众运动。每一次解放一批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要表现出激动万状的样子，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时还喜极而泣，眼泪似乎是真的眼泪。这是事先彩排过的演剧。大家情知有些儿言不由衷，但我们这些非牛鬼蛇神又何尝不曾虚情假意呢。驾驭人的技术，马基雅维利的手法，打你一巴掌，再给个豆豆吃，你就感激涕零。当然各个击破，鼓励告密，互相检举，是最有效的。

北师大另外一些学者就比较顺遂：白寿彝。顾颉刚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白寿彝在北京师大亦已被定为三反分子。此人在解放前靠人周济渡日，垂二十年，解放后即若不相识。由于拍陈垣，得任师大历史系主任。由于拍尹达，得为历史所兼任研究员。以回民故，得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拍吴晗，得为历史小丛书编委。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白寿彝是北师大工宣队树立的榜样，受到大会表扬。

### 三

文革我在北师大外语系认得了著名诗人郑敏老师。1960年，她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调到北师大。她回忆说，下放到山西农村，正是“大跃进”时期，当地领导天天带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看农民吃酒席。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都大吃大喝，意在表明：“咱们农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实际上，这是大锅饭。当时农民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吃的却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能喝稀的了。

郑敏回忆，第二次正式插队到农村，跟当地农民住在一个炕上。劳动结束后，那家的主妇烧一大锅水，只下一点点面条。男劳动力可以吃上面条，但她就是一碗接着一碗地喝汤（我在困难时期也喝过大锅清水汤，但决不允许赫鲁晓夫这样说，因为那是污蔑）。郑敏老师说，她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劳动力只能喝面汤。那位主妇偷偷地给这位老师盛了一小碗面条，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要给你吃得好一点。”郑敏很感激地接过来了。可因为这面条没油没盐，一点味道都没有。她觉得难吃得狠，越吃越慢。那位主妇极羡慕地看着她，还问：“你怎么吃得一点都不香呀？”一听这话，她就更心酸了。在那位妇女看来，“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条就好了。”可郑敏说，这是她吃过的最难受的一碗面条。我觉得郑敏就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可我也觉着，劳动人民也喜欢好吃的呀。

当时，因为根本不可能洗澡，插队的老师们身上全长虱子。所谓的厕所，都有两个坑，一个小便，一个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个坑，否则就会把自己溅脏。她说，这种最奇怪的革命生活方式，真是不堪回首。那时的中国人口才六亿人，中国的农民多么伟大，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如果不去农村，她永远不知道中国农村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都跟上海一样呢。然而毛主席说劳动人民尽管脚上有牛屎，也还是干净的，所以我觉着最好三年不洗澡。

她说，“文革”中写诗成了罪状。在一阵阵口号喧嚣的白天过后，她独自坐在书房，借着夜幕，悄悄地将手头惟一皮藏的一部《诗集：1942—1947》付之一炬。当时她认为，此生再也不可能写诗了，中国再也不需要诗歌了。全国将只有一个人的思想和诗词。

“工宣队和军宣队来问她：“你真的下决心不写诗了吗？”她认为如果牺牲自己的诗歌生命可以换得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也是可以的，所以就回答说可以不写。”（见《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一解诗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从1948年到1979年，她在党的阳光下沉默了近3

0年。她大哥王勉则因抗战时担任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入狱十多年。1979年恢复名誉，重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十年代末，昔日的还活着的九位诗友在京华相聚。曹辛之提议每人各选一组四十年代的诗作，出一本合集，书名就定作《九叶集》。此书于八十年代初出版，成为中国新诗觉醒的先声。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诗坛新秀也冲破传统藩篱，推动诗歌以崭新的容姿，登上新时期的文坛。诗言志，人可以有自己的志。庆幸的是，没有亡国灭种。

#### 四

耿志国，红小鬼，出身好，冀中平原人，较早参加革命。他家里有一个革命年代的糟糠，现在应该是离休革命老人了。他去苏联留学，娶了个洋妞，常到苏联大使馆，和一同娶了洋妞的中国姑爷们聚会。中苏友好，一朝翻脸成仇，苏联姑爷变“特嫌”。1968年“清队”，他们教研室下到我们班，我是班长，老师们以为我们学生个个都是吃人的小老虎，提心吊胆，见了我低头哈腰，以为我掌控生死大权。他们喊我不叫名字，而是喊我“班长”。我出足了风头。耿志国的糟糠之妻和许多革命者进城之后喜新厌旧者的妻子的下场一样，和鲁迅的原配一样，离婚不离家。她是县委的机关干部，也做牺牲品。他那个苏联妻子中苏蜜月过后，就回到苏联，两人有书信往来。每次苏联来信（情书），都先落在工宣队手里。工宣队让我班董丽琴、王昭碧口译。那时候公民没有个人隐私，当然没有私民，只有公民，通信不受保护（资产阶级在中国是阙如）——耿志国你当年打家劫舍，应该懂得。信很肉麻下流黄色低级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因为结尾竟然是：“吻你，kiss you”！！！！只听董丽琴同学（少女）脸“刷”的一声——工宣队师傅听到响声一看，只见——脸红了。那是什么年代，你还有时间接吻？大概每过几天，董丽琴就脸红一次。工宣队那个乐呀，乐开了怀。

要耿志国交待苏修特嫌问题，也没嘛证据，反正穷追猛问，宁肯错案，不可放过。耿志国说他是小羊，说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借口，我们就说他诬蔑革命群众是狼。成天打嘴仗，斗嘴皮子，鸡蛋里面找根骨头。连我们都烦了，也止不住乐了。细想，他耿志国即使想出卖情报，也得有库存呀。有些人里通外国也不够格——你掌握什么机要呢？如果他们对外人谈谈自己的感情遭际，那也不是神马大不了的，不会国破家亡。

#### 五

文革初衷是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革规章制度。“清队”本不在此例。所谓扭转群众革命方向，不待他人而自成。“清队”是文革自缩，是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质言之，是要群众组织搞“窝里斗”。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清队”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说明清队是战略部署。清队中，北师大纵身一跃跳楼自尽的是祁开智教授（注1）。

濮阳翔（后来的教授）是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孙志毅（教师文革小组）端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三青团和忠义救国军。很吓人吧？！原来他在东吴大学，临“解放”时，国民党方面拉人，国共争夺，三青团发展团员，大概最末一班岗发展团员名单上有他（他说他自己不知

道），但此后隆隆炮声就打破了入团梦，连他也不知究竟，就算入了团，也没啦个甚。比如我，文革前刚被支部讨论举手通过入团，还没领证举行典礼，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应该没有历史问题。但濮阳公每天跟着我，把我看作救星。结果大家都笑我。

濮阳翔的第二大历史罪状是参加忠义救国军，在我，就以为这可不得了。他是胡传魁老胡的部下，一定去过春来茶馆，和阿庆嫂智斗过。但他说他不认得阿庆嫂。原来他少年时叛逆时期负气离家出走（安徽人），听说有一支抗日小股武装忠义救国军，但投奔未成，没挂单，没投宿。清理阶级队伍，他紧张了几个月，但我们到老儿也没为难他。因为我知道，那四个人和其他四个八个人无非是让我们彼此恶斗。其实在他们看来，咱们谁都不是好鸟枝头春意闹。昨日红卫兵小将大方向始终正确，一会儿就接受再教育成阶下囚。

濮阳翔还有其他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文化革命前意识形态文化学术大批判，他写过些文章，批判三家巷早春二月。我使劲地从中找寻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精神污染，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真扫兴。那时候，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良心孝顺共和宪政爱情都姓资。不过，人的认知良知隐衷情欲私心，虽然那时还说不上受保护，但也没有被斗私批修，没被抖搂出来。因为副主席还区分小节大节。倒是濮阳先生曾经让郭郁生抄文章，越过男女大防，也成了清队要追究的问题。不过我们未婚，害羞，没有过问。据说他爱人和他吵架说，我要是告发你，你就坐牢。这封匿名信映射了人心惟危。我见过，但查无实据。我坚信他们夫妇有过“反动”言论。比如我们自己，私底下的谈话若抖落出来，十个有十个会进局子。

濮阳翔后来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被整的人后来会成为狱卒、差役、衙役、兵弁，就是看押管理51·6分子董连猛。他的工作是陪睡、陪吃、陪喝，但不陪聊、陪斗。夜间看押董连猛，白天替他打饭。董君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刘文珊、都祖尧、郑守钧、黎浩智，原是落后分子，后来得到工军宣器重。我们的毕业鉴定，按照旧规，是党员负责同志负责，这次是都先生起草。阎王簿掌控。

## 六

凤泉林老师后来成516分子。整他最凶者，是他的同事老师们。老师中政工出身的人，都有一口秀美口才，政治辞汇随时上口，铿锵有力，斩钉截铁，有不容分辨的力量。斗争为纲岁月，人们善于在纲上线上游走。语言无风趣，无文采，但政治思路严谨符合套路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凤泉林在井冈山革委会作战部待过，肯定炮打过周恩来。时过境迁，多大罪状，全无印迹，只知他被关押时间最长。工作日由群众批斗，节假日由老师同学看管。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觉着一个青年女教师看押一个青壮年反革命分子，有多危殆。他有力必多，多年与妻分居，“寡夫”，万一他鼓起了色胆……（我赶紧学郭灯笼手捂双眼，“不可想像”）。他分解力必多的办法是转移视线：看报纸。但也看不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只有一份有火药味的人民日报，都是八股，颠来倒去就那几句官腔。凤泉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倒过来折过来看，正着看反着看，从头至尾又从尾至头，报纸翻烂了，也不见新翻杨柳枝，味同嚼蜡，令人作呕。按说，这也蛮好，削弱了他的攻击欲。

但蒋亨俊老师怒斥：“好好思考罪行，别老看报纸”。把报纸收走了。竹筒倒豆子，挤牙膏，别得滑且滑，就是那时候学来的词儿。他几年没回长春探视妻女，妻子久不见到丈夫音讯，马航失联，便来京探视。在要不要让凤泉林见老婆这有关世界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工宣队和骨干力量争论很久。蒋亨俊老师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他们伉俪见面。但终归人性论占了上风，工军宣队比女政工干部马列主义阿姨们开明专制：允许见面，当晚同寝，

罗衮不怕五更寒。不近人情换作人性论。严厉训斥他的，还有刚才提到的濮阳公。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训斥更弱势的人求得自我优越感。

蒋亨俊老师反对凤泉林两口子团聚事出有因。文革前她是政治辅导员系团委书记。文革前，据说大学里有红黑两色大染缸，分别是党团组织和业务教师，两个大染缸争风吃醋争夺接班人（就是争夺我）。党员，政工干部，书记，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可靠力量。但他们和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当然我更知道，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前留校的大学老师都是经历严格筛选的可靠的革命进步力量，反帝反修都很积极。中美必有一战中苏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中菲必有一战中台必有一战中越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这战略思维，大家彼此不相上下。马列主义老爷爷老奶奶彼此争吵，只是表明自己更左派而已。他们一张嘴，革命社论词儿就从嘴角溜达出来。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一定要牢牢控制在可靠的人手里，绝不能讲授西方教材比如莎士比亚古希腊尼采康德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实在多。唱歌不能唱洋嗓，绘画应该画虎羊，钢琴不该家里放，二胡板胡才正当。

蒋亨俊老师因为比较“革命”，对学生政治要求过严，满口革命词藻，文革伊始就被自己培养的进步党团员从医院病床上拉回学校批斗。我很纳闷，这么进步严肃说话滴水不漏很符合报刊的人怎么还有反动思想？她得的是肾炎，据她说同病房的病友过两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到太平间。她自己能正确对待生死了。但他似乎对别人的性命也不在乎。后来整肃凤泉林，她很积极。因为文革前思想落后非党团员的凤泉林，居然造反成作战部军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常常提到陈秋帆、都祖尧文革前是落后分子。

## 七

最近围绕杨绛的争论，成一舆论焦点。批评钱杨不过问天下苍生不关注社会，和为之辩护，虽然貌似对立，但均不否认知识分子应有社会担待、傲骨和凛然正气。他们的女儿钱瑗，我们的老师，文革中和我们一样，尽力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这没有过错。不过，在清除林江余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袖手旁观，不会把雷洋呼格吉勒图余祥林案以及社会纠错当做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因为我们不是获利集团。北师大外语系钱瑗老师文革不卷入，毫无疑问是正气，“正能量”。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于钱氏夫妇的评论和纪念，就不讲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钱瑗老师是好人，文革的1968，河南淮河发洪水，我的同学——后来我的妻子——借过钱瑗的钱。她解过燃眉之急。我们感谢她。据说有一位高年级学生借过他的钱，毕业后就“失联”。传闻归传闻，但我更相信那位同学后来肯定还钱了。知识分子民胞物与，不必登高一呼，自投罗网，但也可以发声——牛“哞”地叫一声。钱老师绝不是害怕烧伤手指的人，更不是抡棍挥棒扣帽为虎作伥之人。

杨绛去世，反响极大。一位友人微信说杨绛：“除了她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上的造诣外，她对人生、对社会，都有通透深刻认知，对极权社会的弊端敢于评揭。她是社会良知和正义脊梁骨。”文革史的研究，就旨在发扬傲骨。杨绛的女儿钱瑗是我们的老师。我不知道对她的回忆是否可以激起男儿之志。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搞美术的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 a o（妖）”，这便是“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是“鬼”；外语系的钱瑗是四人中惟一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北师大的路旁和主楼高悬的毛泽东巨幅油画画像，据说处于王德一之手，

另外一个画手隋玉梅，北京人，去大庆造过反，学大庆战斗队总负责。清查516，全校批斗，说他在大庆冒充怀孕，她大声说“造谣”。她后来分配到银川师范，教语文和美术。

北师大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王德一，1937生，1970年自杀。钱瑗于1959年毕业留校。1968年初，钱瑗与王德一结婚。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载：

“德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时，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德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德一已回校，阿圆（钱瑗的小名）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德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德一，逼他交出名单。德一就自杀了。”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德，得，通假字。天得一以清。得一死后得昭雪。我们历次的讨伐清理运动，有哪一次不是伤及无辜越搅越浊呢？我们能不能汲取应有的教训呢？

章廷桦老师回忆，1960年春节前后，钱瑗邀章廷桦等同学到家作客。钱钟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钱老得知章廷桦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接着他谈到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语极好。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独女。

文革前，《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委员会由钱钟书负责英文翻译工作。钱钟书的英文造诣堪比国学功底。当英国劳伦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拿到第一卷译稿后，惊叹道：“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当时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金岳霖、王佐良、浦寿昌、北师大外语系的郑儒箴等著名学者和翻译家。

## 八

我们那位从未亲聆髭咳的老校长陈垣，史学家，毛泽东称其为“国宝”。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鹭藏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1949年他在国共之间选择了后者，婉拒蒋介石和老友胡适的赴台邀请，而是留在大陆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陈垣拒绝了。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的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

文革前他每年两次来师大和大家见面：开学典礼的和毕业典礼。他在文革岁月也心惊肉跳。但文革中谁也没有想到拿批斗他来显山露水。倒是他的下属历史系一位老师施建中受到牵连。有一张陈垣几代学人五世同堂的照片被公开，算是捎带涉及陈垣。但我后来知道，陈垣的亲炙弟子并未留校，其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好像北师大历史系不是某个姓氏的天下一一现如今大学留校的是亲属和弟子，以建立学派。但陈垣没有自己的家丁兵团。施建中，1940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1959考入北师大历史系，1962年北师大校庆60周年时被推选与陈垣校长、白寿彝主任、杨钊先生、杨子坤先生合影（即，五世同堂照片）。文革正盛的1971年6月25日陈垣寿终，终年91岁。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全部交公。剩下的不值钱的书籍遗留在北师大图书馆一楼大厅。1971年夏，我翻检淘金，有语文课本，内有古文，我爱读。有一位国民党旧军官解甲归田，写了一册幻想乌托邦的小书，我拿了。

陈垣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说：“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陈垣写了对新生活的感受，指出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有基本错误”。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公开信往往是挑战书，私教用不着。决斗书要用公开信。强势一方觉着理直气壮。彭德怀后来也许胡陈黄泉路上终于相见，黯然神伤。陈垣还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思想为之一变。

“文革”中，陈垣家人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恩来，一封给康生，说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

陈垣给胡适的信，和他给上头的信，可以做对观阅读。对观福音、符类福音，又称共观福音、同观福音，这里就是对观福音、符类福音、共观福音、同观福音。

胡适不相信那封公开信是陈垣写的。给朋友写信，照道理应该邮寄给本人。私交呀，挚友呀，密友呀，心照不宣，心心相印，莫逆之交，股肱之交，才是朋友。这位饱学之士的多少盲目乐观与难堪尴尬，无人知晓。

刘乃和（1918—1998），女，多年担任陈垣秘书。文革岁月一次批斗会上，见过她。

## 九

清查整肃造反派，左派整风，秋后算账，是战略部署，群众是被利用而已。在造反派，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自以为得逞，其实是过河拆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精心设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党、政军民学、工

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分别轻重，酌情处理。不提“当权派”，从此，百姓、普通人，矛头就要对准他们。左派整风，无须三年以后，不待三载。

北师大在整肃名义下走投无路的还大有人在。整肃，斗争哲学，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井冈山革委会在遭遇清剿之前就把同伙造反兵团打成小爬虫。我的朋友郑艳芬，同班同学讨伐的大字报题目是“拉开序幕看好戏蛛丝马迹追顽敌”。井冈山革委会整人不遗余力，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上耻辱的十字架。清查516，这是师大历时最长，也最催逼人的运动，最惨烈，最无情，但也最不可思议：基层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大积极撰文回忆这一段历史。

纵观文革各个时期的反革命敌特分子、联动、516、十二月黑风、右倾翻案风，进而回溯历次斗争揪出来的和遭遇批判的人，地富反坏右、三家村四家店、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以及清污、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全盘西化论，所有的检举控诉揭发批判材料，无须去伪存真，无需筛选过滤，把当时罗织罪名构陷材料罪状原样拿来一看，就豁然开朗，就知道，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罪行。甚至叛徒特务汉奸恶霸黄世仁收租院、刘文彩，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人。冤假错案冤狱平反，而且宣告不再用运动整人，的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福音。文化革命更是人整人。人对人是豺狼（霍布斯）。整人者又被整。被整者反过来整人。你方唱罢我登台。我们有一种亡命在即的危机意识。“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被清查出来的，即使按照那个特定年代的标准，也的确不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倒是杞人忧天多一些。

工宣队进驻北师大以后的文化活动：1971年中共50周年，各系出版贺喜的诗词歌赋，叫板报，中文系出足风头。书法家启功为之挥毫，立功赎罪，竭尽对文革对林江献媚之能事。我有一首诗，歌颂乒乓外交，偷来两句，其中有“银弧条条，银球点点”字词，好像很雅，其实虚假。无病呻吟这个成语出典就在这里。陈铎老师（已故）见面就拿这两句开涮。迎接九大歌咏表演，曹宝剑袁剑青大出风头。文革时公映的电影译制片，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和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伏击战》，享誉中华。流行的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蚰蚰叫，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罗马尼亚搂搂抱抱”。1970年至1973年，故事片还有：《南征北战》和抗美援朝故事片，以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等。

顺便说一说闹剧中的平静。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北师大是“文革”时期造反派活跃的中心之一，复课闹革命任务更加艰巨。11月3日起该校提出教改方案。要求废除现行考试制度，新的考试方法，必须突出政治，着重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要面向工农兵开门办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又红又专的青少年进入高等学校。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就这么来的。我和雷天生刘来牛等奉命去通县一个村子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和农民朋友住一个炕上，好像什么收获也没有。1967年冬复课闹革命，刘宝英老师给我们讲授英语的两报一刊社论以及英语老三篇，就在北师大中北楼302女生宿舍。教材是钱瑗、严伯森老师编写，他们添加生词注释和短语解释。朗读者为大郭。复课闹革命还知道了，王居恒老师虽然是北外毕业，但他的英语发言实在不敢恭维。他朗读课文的录音，音调怪怪的。北师大的老师，外国归来的，汉语说得不流畅。比如严伯森，不知道“浩浩荡荡”神马意思，说，“我们三个从天安门浩浩荡荡走回来”，大家哄笑。

2016年5月23日

〔注1〕文革前北师大六位一级教授：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二级教授：汪堃仁、周廷儒、郭一岑、邱椿、谭丕模、穆木天、刘盼遂、胡明（外语系，自杀）、白寿彝、张禾瑞、蒋硕民、祁开智（自杀）、郑华炽、张宗燧、鲁宝重、陈光旭。三级教授石磐、马特自杀身死。

来源：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